

港澳研究

- ▲ 比較粵港澳大灣區與歐盟和三藩市灣區

香港

社會科學學報



他鄉故事

- ▲ 海外就業價值鏈與心理建約：抖音博主分析
- ▲ 比利時臺灣移民的交友實踐與互動

國際研究

- ▲ 烏克蘭危機：國際權力競逐與虛假訊息效應

社會研究

- ▲ 中國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狀況

書評

- ▲ 《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
- ▲ 《香港法律語言常見拉丁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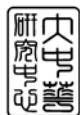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八期 2022年春/夏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8 Spring / Summer 2022



大中華研究中心
Centre for Greater China Studies

差異化、精英化與 衝突性

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狀況 的調查與分析

Gender Differentiation, Consumption Elitism and Institutional Conflict

A Field Report on Wildlife Consumption in China

李芝蘭、盛義龍、楊振杰、陳麗霞*

Linda Chelan LI, Yilong SHENG, Zhenjie YANG,
Lai-Ha CHAN

*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後信任社會視域下我國食品安全風險治理機制研究》(18BGL214) 的資助。

特別感謝武漢工程大學碩士研究生熊天歌、彭志強和劉園園同學對問卷調查及資料處理的辛勤付出。

李芝蘭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盛義龍 武漢工程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楊振杰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陳麗霞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高級講師

收稿日期：2021 年 10 月 28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 月 18 日

摘要

食用野生動物作為人類社會變遷中長期既存的社會習慣現象，是極為複雜多元的社會實踐生成。在借鑑過往研究基礎上，我們設計了問卷以期對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現狀及其特徵予以揭示，為後期持續研究提供探討基礎。基於 826 份有效問卷的分析，本調查初步發現，當前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的總體態勢持續下降，食用野生動物並非普遍的社會現象。圍繞「性別」、「職業」、「年齡」和「文化程度」四個因素的對比分析，呈現出「性別差異化」、「消費精英化」等特徵，同時，公眾良好食用行為養成可能存在內外張力的衝突。後期可重點聚焦在「社會階層如何影響食用行為」、「公眾食用和不食用行為動機分析及其變遷機理」、「公眾良好行為學習與改善轉變的影響因素及其機理」等議題展開持續深入研究。

關鍵詞

社會調查、差異化、精英化、野生動物、衝突性

Abstract

Eating wildlife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social custom, and its changing pattern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complex and diverse social practices in societies. Leveraging on the past social surveys,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findings of a 2020 survey, with 826 completed sampl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public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and that it has ceased to be a popular habit by the majority of our sample.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our factors of gender, occupation,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the current public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differentiation’ and ‘consumption elitism’. At the same time, there may be conflict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nsion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good eating behaviour. The article also outlines some future directions of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Keywords

Conflict, Differentiation, Elitism, Social investigation, Wildlife

一 引言

食用野生動物在人類與自然交互中長期存續，全球範圍從未消失，中國亦是如此。伴隨經濟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其間也蘊意着不同社會意義和時代追求。作為一種既存的社會實踐現象，有傳統歷史文化的深刻影響，以及一般社會習慣使然，也有部分「小時代」中個人理性選擇驅動¹。當然，對此類行為的自我反思、社會努力及相應制度調適也沒有間斷停滯。特別是繼 2003 年“SARS”、2004 年「禽流感」之後，直至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集中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2020 年

1 既有理論性解釋大致可歸納為幾種：一是廣義層面的文化釋義，如某類族群內生性的「文化認同」，或者「果腹」之需，是某種特定的人與自然關係文化衍生。當然，工具論者對此類「原生現象」仍傾向於建構主義解讀，認為是其文化的「自我強化」或者更為廣泛的社會建構（王明珂，2006；西敏司，2018）。此類往往僅限於特定時空下少數傳統文化群體，具有較為明顯內生性。二是作為一般社會性的習慣或關於社會行動的習慣，是在一個區域或特定群體內被普遍認同並自覺遵守，且反覆出現、可以預期的社會行為規則。其本質是一種行為準則或非正式規則，表現出地域性、歷史性、自發性、反覆性等特點。三是個體理性選擇行為。制度經濟學以「理性人」為前提，認為相對獨立的、具備理性的行為個體具有有序偏好、完備資訊和精確計算能力，能夠利用掌握的資訊來預估將來行為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做出最佳決策，達到效用最大化（約翰·伊特韋爾等，1996）。

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將政策指向由之前的「保護野生動物資源」²模式迅速切換至「全面禁食野生動物」模式。然而，此類政策規制能否有效發揮避免和防範濫食野生動物之功能，必然有賴於公眾良好「食用習慣」的養成及其約束引導機制的作用。之前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並不理想（龐仙，2020），似乎國人真如外界所言的「什麼都能吃、都敢吃」，在「物質財富極大增長」的同時「窮得只剩下錢」。顯然，這種刻板印象對於塑造良好國際形象多有偏頗。

那麼，對於當前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以及「怎麼辦」等問題，亟需開展系統性、針對性的社會調查研究，以瞭解當前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現狀及特點，準確地分析其行為本身的動機意義，探討未來制度建構和努力方向。既有英文文獻中有少量類似研究，如楊乃芝（Yeong-Nain Chi）和簡·盧紫（E. Jane Luzar）等通過運用1991年全美國家釣魚、狩獵及野生動物遊憩調查資料對非消耗性野生動物遊憩消費支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認為「性別、就業狀況、種族膚色、個人收入」以及「公私有林地」等具有相對顯著性（Chi and Luzar, 1997）。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大陸學界對此鮮見持續關注，至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後才略有涉獵：從倫理道德視角的審視（曾建平，2020；陳嘉傑等，2020），亦有從生態文明角度強調「人類與野生動物，應該共存」（張文娟，2020），但均停留於一般宏觀層面的理論辨析。值得欣慰的是，恰恰是

2 中國內地於1989年正式頒佈，迄今先後經過四次修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旨在為保護、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維護生態平衡。

社會實務界曾有過類似的社會調查和跟蹤關注。如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先後於 1999 年、2005 年開展的兩次全國性食用野生動物狀況調查，圍繞「年齡」、「性別」、「職業」和「文化程度」等特徵及其食用原因進行了一些調查分析。為此，我們在充分借鑑過往社會調查、研究文獻和自身生活經驗的基礎上，自行設計了一份「公眾食用野生動物情況調查問卷」。問卷設置了 21 個問項，主要包含三大部分：（一）個體特徵與食用狀況。前者包括性別、居地、年齡、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職業等；食用狀況則包括食用、不食用行為以及食用行為變化狀況等。重點瞭解「是什麼」的問題，並期望形成本調查的初步分析和發現；（二）行為動機。包括食用和不食用行為的各自理由，旨在通過對於各類行為動機或理由的調查，重點分析解釋「為什麼」及其背後生成機理（另文對此再作詳細討論）；（三）對於當前有關野生動物保護和禁食政策的認知與態度。期望在制度建構層面，分別從政府、社會和公眾角度對食用行為的未來規制、引導和調適提出可能的、適當的政策建議，重點解決「怎麼辦」的問題，這或許能為重構良好食用習慣的政策實踐提供啟示。

問卷調查工作集中在 2020 年 4-6 月，正處內地疫情管控措施剛剛「解封時段」，我們主要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先後進行了兩次。線上問卷對象的年齡及地域範圍不限，線下問卷則僅限於武漢市。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826 份，使用 SPSS 軟體（19.0 版本）進行統計分析。樣本涉及絕大部分省市區，集中在湖北、廣東、山東等省份（圖 1）。

樣本人口總體特徵（表 1）：（1）年齡上多集中於 18-50 歲人群，共佔比達 89.3%，基本反映出當前社會最具活力人群和社會行動者。（2）性別上，女性佔比 57%，男性佔比 42.9%；（3）文化程度水準較高，大學本科及以上 79.1%；（4）職業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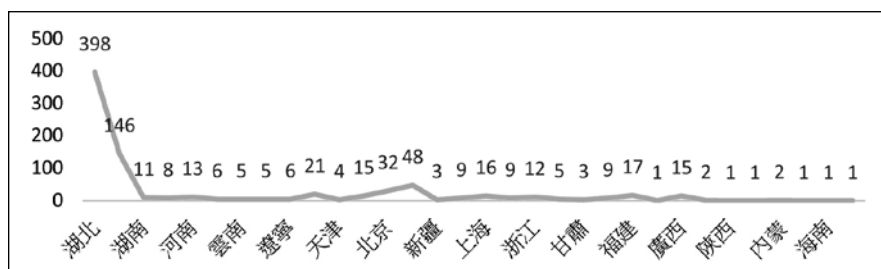


圖 1：調查對象的常居地

成主要有學生 44.3%、事業單位人員 24%、公司白領 7.6%、政府幹部 5.4% 等。同時，通過初步相關性分析，發現「年齡」則存在顯著正相關（P 值在 0.1 的顯著水準上，相關系數為 0.192）；「性別」、「文化程度」和「職業」存在顯著負相關（P 值在 0.01 的顯著水準上，相關系數分別為 -0.136、-0.067、-0.096）。為此，我們在把握公眾食用行為的總體狀況基礎上，集中圍繞這四組資料進行分析挖掘。主要對「食用行為」、「不食用行為」以及「食用行為變化」的不同佔比的直接對照與比較分析，以期形成一些可能的初步發現。

表 1 調查樣本的人口結構

類別	選項	頻率	百分比	類別	選項	頻率	百分比
性別	男	354	42.9	年齡	18 以下	11	1.3
	女	471	57.1		18-30	483	58.5
職業	農民	27	3.3		31-40	125	15.2
	工人	37	4.5		41-50	125	15.2
	個體老闆	25	3		51-60	58	7.1
	公司白領	63	7.7		60 以上	20	2.4
	政府幹部	45	5.5	文化程度	小學及以下	8	1
	事業單位人員	198	24.1		初中	39	4.8
	學生	366	44.5		高中（中專）	44	5.4
其他	62	7.5	大專		74	9	
				大學本科及以上	653	79.8	

二 「吃多抑或吃少」：公眾食用的總體樣態

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的總體樣態着重從一般層面反映公眾是否食用野生動物的狀況，以及食用行為有無變化及其可能趨勢。包括分別有多少比例人口「經常吃」、「偶爾吃」和「沒吃過」，以便大致判斷公眾食用行為的分佈狀態及其縱向歷時的相對變化。當然，這種比較的可靠性是值得警惕的：一是問卷中具體問項的前後一致性和精確度。我們在參考之前調查問卷和生活經驗基礎上，確立了一個大致合理的範圍。如「經常吃」和「偶爾吃」的區分，基本按照「一年3次以上」即為「經常吃」，「一年3次及以下」即為「偶爾吃」。同時為了盡可能讓被訪者能夠更為準確、自主反映自身的真實情況，除了要求匿名參與調查之外，我們還專門訪問「過去的一年」的食用情況；二是調查樣本結構本身的合理性以及與之前調查的可比性。前者要求前後不同歷時段的調查樣本最大程度吻合該時段社會人口的總體特徵，後者則要求在具體人口特徵上能夠保持前後調查樣本結構的相對延續性。限於此次調查條件、技術等方面的不足，我們在實際問卷調查中很難完全有效做到這些，期望在未來的持續調查中對於問卷及其調查方法作進一步優化。事實上，類似的歷時段社會調查追求絕對意義上的可比性既無可能也沒必要。我們通過前後數據的比對，如僅從「年齡」（18歲以下 1.3%；18-30歲 58.5%；31-40歲 15.2%；41-50歲 15.2%；51-60歲 7.1%；60歲以上 2.4%）、「性別」（男 42.9%；女 57.1%）結構特徵來看（表1），本調查樣本能夠大致反映當前社會人口狀況現實，且具有前後比較意義。

我們將本次調查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2次社會調查進行對照比較：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1999年調查統計顯示：公眾「吃野生動物已成風氣」，「場所增多，種類增加」，

「經常吃」和「吃過」的人口佔比高達 48.9%，至 2005 年「比例下降」，「71.7% 表示未食用過野生動物」，不食用人口「提高了 40.3%」（楊猛，2006）。但食用種類不斷擴增，新增 26 種，達到 80 餘種，且呈現出明顯地域特徵——「南方城市經營野生動物的餐館明顯高於北方城市」（楊猛，2006）。與此同時，廣東省林業廳採用相同問卷在 1999 年針對廣州市市民進行調查，顯示未食用比例為 44.6%，較全國層面（51.1%）少 6.5%。這一點與之頗有印證。就本次調查來看（表 2），表示「沒吃過」佔比持續上升，至 2020 年達 88.9%，絕大部分人未食用過野生動物。即使完全剔除本次調查中的「學生」樣本（佔比偏高 44.5%），其比例仍高達 84.13%。而「偶爾」和「經常」食用佔比分別僅為 10%、4%，相較於 2005 年、1999 年持續下降。顯然，總體上公眾食用野生動物行為發生並非普遍，且呈現持續下降態勢。

表 2 公眾食用行為發生頻次對比

調查年份	「沒吃過」	「偶爾」	「經常」
1999 年	51.1%	46.2%	12.7%
2005 年	71.7%	22.9%	5.4%
2020 年	88.9%	10%	4%

當然，目前我們很難清晰準確判斷公眾食用總體樣態及其食用習慣趨好的具體原因。除了公眾的自然人口更替因素之外，外在的社會規訓和法規制度的作用也應是可能的。比如，長期的科學普及、國民健康安全教育和法律規制，可能逐步提高了公眾科學認知、安全意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於「藥食同源」等傳統觀念難以保持較高認同和固守。特別是近年來連續不斷的較大範圍的病毒疫情困擾，無疑對人們都是一次次身

體和精神的衝擊洗禮，也可能引致個體深刻自省。事實上，官方和有關的科普組織也往往選擇在特別疫情時段主動「化危為機」，從而有意識地強化宣導或者做出特別政策革新與突破。此次新冠疫情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迅速作出《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這一非常規式的政策突破實際上會面臨諸多國家部門、地方政府和生產經營者，乃至公眾消費不同程度抵制。縱然其難以避免「運動式治理」後果，但就政策變革本身而言，也是尋求突破的「時機」。

此外，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生產力提高，人類已經開始從傳統依賴動物提供高蛋白質維持生存過渡到物質資源豐富時代的「食物自由」。近些年流行於歐美的素食主義和新素食運動，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繼 2000 年 5 月北京大學首次成立素食協會之後，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也紛紛成立素食者協會，並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喚起公眾意識的覺醒。有關統計顯示——中國的素食人口已經超過 5000 萬，素食市場在 2015 年到 2020 年期間增長 17%（劉瑞瑩，2018）。

所幸，公眾食用總體樣態趨好這一點讓我們對於構塑良好食用習慣持有基本信心。隨着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公眾的科學認知、安全意識和理性文明程度逐漸提高，食用野生動物行為可能會越來越少。食用或者不食用野生動物不僅僅表現為一種飲食方法，還會追問到哲學層面的世界觀：人與自然的關

3 一般而言，無論在西方抑或東方社會均一直存有素食行動。早在西漢末年，傳統「素食」隨着佛教傳入中國，秉承戒殺放生食素。這種主要由宗教信仰「食素」，一般稱之為「齋」或「齋戒」。與之不同，新素食者則多為受過良好教育，往往不是為了單一的宗教信仰而食素，並逐漸發展出較為成熟的三大理念：「拯救動物」（關心動物的權利）、「拯救地球」（為全球暖化而擔憂）、「拯救自己」（在意自身健康）。

係。當前國家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這是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總體定位。

三 性別差異化：男人愛吃，女人樂變

通過選取「性別」要素分析，發現男性、女性分別在不食用人口中佔比與在總體樣本佔比的差異及其變化具有顯著差異（圖 2）：一是女性在不食用人口佔比（59.8%）大於其在樣本總體中的佔比（57%），而男性在不食用人口佔比（40.2%）小於其在樣本總體中佔比（43%）。因此，更高比例的女性人口不食用野生動物，即相對女性而言，「男人更愛吃」。二是我們專門抽取了發生「食用行為變化」的樣本人口，其主要行為變化是從「食用」轉變到「不食用」有 222 人，而從「不食用」轉變到「食用」僅有 14 人。公眾食用野生動物行為變化同樣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男性變化相對比例呈反向趨勢，女性變化相對比例呈正向趨勢。因此，女性食用行為發生轉變的可能性更高，更樂於改變食用野生動物行為，從而樹立良好食用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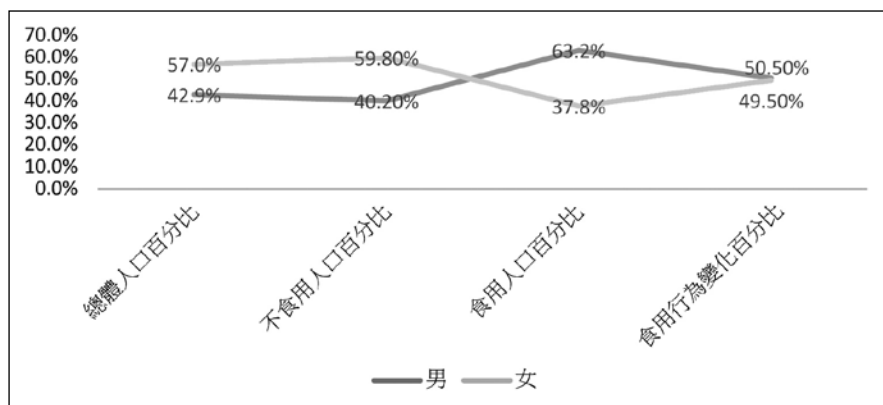


圖 2 性別佔比對比

學界對於性別與野生動物之間關係較早便有研究，尤其是在生態女性主義論述中多有討論。如卡羅爾·亞當斯(Adams, 2000)在《男人愛吃肉·女人想吃素》中，認為對女性的統治和對非人類他者的統治之間存在着歷史、觀念以及實踐方面的聯繫。從社會發展歷程來看，無論是古代父系社會，還是近代封建社會傳統女學，都不同程度體現為女性附庸於男性或者不利於女性獨立自主的封建宗法制度。即使現代女性地位得到極大提升，仍不免發生諸多性別歧視和家庭暴力等。據全國婦聯 2005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 2.7 億個家庭中大約有 30% 存在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朱寧寧, 2009)。女性這種被支配的弱勢地位更容易引發人與動物扭曲關係的反省反思。隨着現代倫理學的發展，人們尤其是現代女性開啟了對於食用動物的倫理審視，首先意識到動物並非天生就該被人飼養屠宰，供人食用。格雷·高(Kao, 2005)則在《生態女性主義倫理中的一致性》中解釋指出素食主義者是那些願意把對非人類動物的憐憫和同情轉化為飲食選擇的人。依此來看，公眾在食用野生動物所表現出來的「男人愛吃、女人樂變」的差異化，顯然支持這點。

四 消費精英化：精英階層的執悟與「迷信」

現代分工社會中的「職業」，往往能夠集中體現公眾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也是構成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的重要表現之一。彼得·M·布勞(Peter Michael Blau)和奧提斯·杜德里·鄧肯(Otis Dudley Duncan)(1967)在《美國的職業結構》中就提到，「職業結構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不僅構成了社會分層各主要維度的重要基礎，還構成了不同社會生活制度和領域之間的聯繫紐帶。聲望分層等級和經濟階層等級都根植於職業

結構」。由於職業具有客觀性，在某一特定的社會中它對應着相應的經濟收入、權力地位和社會聲望，具有一定程度的綜合性，所以各國社會學家紛紛用它來進行社會分層。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曾提出以職業分類為基礎，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將當今中國的社會群體劃分為十個階層：1.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2. 經理人員階層；3. 私營企業主階層；4. 專業技術人員階層；5. 辦事人員階層；6. 個體工商業階層；7. 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8. 產業工人階層；9. 農業勞動者階層；10. 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陸學藝，2002）。

為此，我們通過比較不同職業食用行為相對比例高低，試圖分析各種職業食用行為集中程度或者判斷其行為可能性的高低。為了盡可能消除各職業類型在總體樣本數量中佔比的非均衡偏差影響，我們分別計算出在各類職業中食用行為所佔比例與該職業佔樣本總體比例的比較值，即不同職業食用行為相對比例值。其中，縱軸「1.0」值代表總體可能性的均值線（圖3）。可以明顯發現，「個體老闆」、「政府幹部」、「公司白領」、「事業單位人員」幾種職業的食用行為相對比例值大於「1.0」，依次為「2.67」、「1.70」、「1.51」、「1.44」，其集中程度相對更高；而「學生」（0.44）、「工人」（0.76）相對比例值則小於「1.0」，其發生食用行為可能性更低。

如若參考前述中國社會階層劃分標準，顯然，前者和後者在當前「社會分層」中具有較為顯著意義。前者多屬於商業菁英和政治精英階層，後者屬於大眾階層或暫無自主性經濟社會地位群體。籠統概之，當前食用野生動物明顯呈現出消費精英化：有錢吃得起，有權吃得到。一方面，作為一種稀有資源競爭和消費行為，食用野生動物與其經濟收入水準有關。類似分析證實「野生動物產品價格及公眾的收入水準」是公眾食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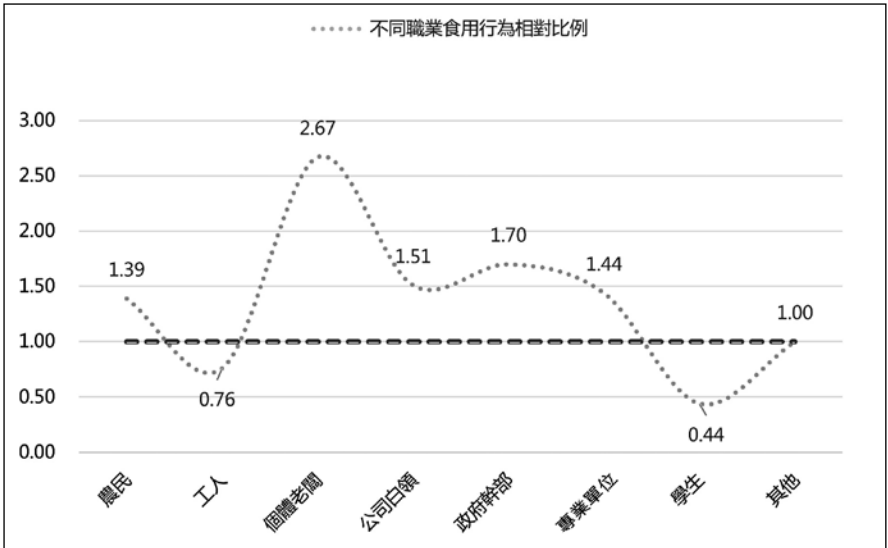


圖 3 不同職業食用行為相對比例

為選擇的主要因素（時小琳，2012），即通常所說的「吃得起」；另一方面就是「吃得到」，更多是一種社會地位或者權力因素。比如在傳統社會，某些珍稀資源的野生動物往往被視為珍奇美食。⁴ 清王朝時期，東北林區「飛龍」野禽還被特別列為東北守官貢品目錄，每年兩次入貢（王賽時等，1998）。貢品自然也是普通老百姓難以企及的，至今尚存的某些政府部門「特供」亦是傳統「官本位」思想的沿襲。正因如此，食用野生動物行為也就同時具有另一個面向——地位和身份建構意義。亞卡

4 如鷓鴣在漢代的已是身價陡增，南方更是將其作為野禽特產。唐宋許多著名詩人對其多有偏好，讚譽有加。如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簡明洞天五十韻》云：「鄉味珍彭越，時鮮貴鷓鴣。」（《白氏長慶集》卷二六）；柳宗元《放鶴鴿詞》云：「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羽毛摧折觸籠禦，煙火煽煽驚厄廚。」（《柳河東集卷二）；楊萬里《食鷓鴣》云：「江南厭聽鷓鴣曲，嶺南初嘗鷓鴣肉。」（《誠齋集》卷一七）。

瓦 (Hayakawa, 1963) 和布朗 (Brown, 1991) 曾經區分了三種地位，其一就是通過購置物品或接受服務而實現的精英地位凸顯。高成本符號理論也指出，某些個體致力於高成本的行為，通過始終不變的消費行為來獲得地位 (Frank, 2010)。即通過變相操縱「自身地位」，從而得到社會名流所享有的福利和獎賞，可能暗含某些個體理性選擇的非理性建構。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當前一種現代消費行為，無論是客觀結果抑或工具理性建構意義上的精英化表現均是顯在的。

無疑，這點是值得警醒和反思的。一般而言，精英階層對於社會進步及變革具有引領作用，美好生活文化構建需要社會精英的良好示範，因此，理想的精英主義往往是具有一種高道德的自持。正如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道德情操」或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的「新教倫理」所強調的競爭本身不能排斥包括道德在內的的目的性。以人類歷史演進而言，上層精英開啟高度文明是因其勿需擔憂生存和物質匱乏，而有餘力去發展文明。即通常所言的，處於優勢地位的階層，在獲得物質豐裕滿足之後會主動追尋「精神層面需求」。倘若社會精英的「品德」和現代社會文明變得不太相關，自身沒有「永恆性的體認」和「成長的自覺」，不能夠「知行合一」地去求真，那就可能成為「無知者」。法蘭克福學派曾對二戰後西方社會精英的墮落作出解釋，認為是對環境變化的反映——因為當時西方社會經歷了高速經濟增長，向「富裕社會」轉型。這種轉型使得精英階層行為開始「消費社會」化，即從傳統以「道德」轉向以「大眾」為基礎的行為。

事實上，近年來內陸社會也屢見少數官員、商業菁英人士在獲取優厚的物質滿足之後，時常表現出悖逆大眾常識的精神執悟和「迷信」。其實質則是其精神追求的某種異化，如「王林大師」現象 (余清楚, 2016)、德不配位的「徽州宴」事件 (騰

訊網，2021) 等等，可見一斑。精英的「迷信」表明一些中國精英並未能將自身從傳統糟粕的母體中完全脫離，與時俱進。更有甚者，則將其精心包裝起來，成為傲視大眾的武器或個體身份構建的追求。其後果會帶來社會秩序危機，一方面整體上缺乏批判反思，陷入社會集體性迷失和失語狀態；另一方面，傳統「品德」的缺失可能會引致簡單法治，現行制度難以持續改善，又會促進內部秩序惡化。

當然，這需要反過來去深入精英階層內部，細究不同類型的精英階層對於食用野生動物行為究竟有無以及如何相互影響，這又涉及到對於「階層」的「自我定義」和「他者定義」。我們將會在後期的持續調查研究中加以重點關注分析。

五 內外衝突性：良好行為養成的張力

良好食用行為養成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整體層面分析不同年齡階段食用行為狀態特徵，即年齡與公眾食用野生動物之間具有怎樣的相關性；二是從個體層面，良好食用行為改善變化即從以前「食用」轉向現在的「不食用」的影響因素分析。公眾食用野生動物會隨着「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即年齡與食用行為是線性關係。其解釋是年齡越大的人存有更多「食藥同源」的傳統認知，食用需求更強——「60歲以上老人具有長期飲食傳統和同源滋補的觀念，對食用野生動物有特殊偏好」。對此，我們通過比對不同年齡段食用人口佔比、不食用人口佔比的相對變化趨勢（圖4），發現兩者並非線性對應關係，而是出現了交叉：18-30歲不食用比例最高，41-50歲食用比例最高，60歲以後食用比例反而下降，且不食用比例出現上升。顯然，這與之前明顯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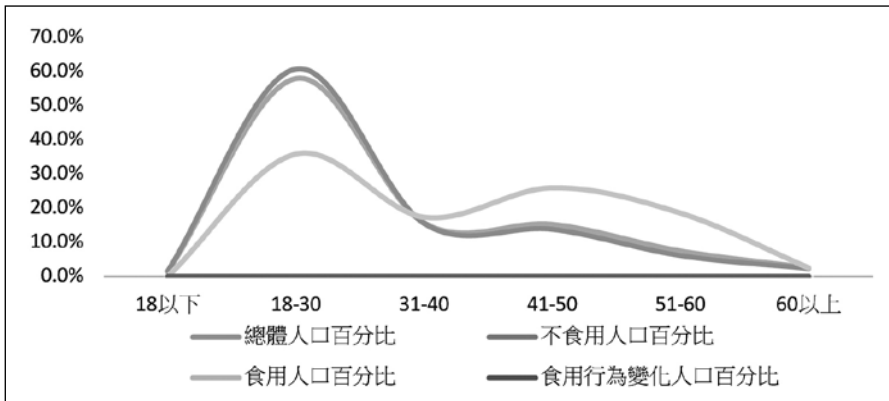


圖 4 年齡佔比對比

如何解釋這種非線性關係？這就涉及到「年齡」背後的意義，事實上作為現代社會建構意義上的「年齡段」，不僅包含個體生物學意義上的生理特徵和需求差異，更意味着不同年齡階段的社會屬性差異。比如公眾個體會伴隨着年齡變化，在不同年齡段往往具有不同的社會聯繫和人際交往程度，而這種不同年齡段行為更多取決於其社會屬性或者社會交往的需求。依多數人社會實踐經驗來看，18-30 歲處在求學或初入社會，31-60 歲逐漸從學校走向社會，開啟職業生涯和社會活動，其社會交往程度更高。而 60 歲以後則逐漸回歸家庭和個體。依此而言，公眾不食用或者食用行為選擇並非取決於年齡本身，更大程度上源於個體社會化程度或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

那又如何理解「線性關係」到「非線性關係」的變化呢？這意味着前後食用動機的變遷。首先我們排除受調人口年齡自然增長因素，此次調查與 2005 年調查相距約 15 年，即 2005 年調查「41-50 歲」約等於本次調查「60 歲及以上」人口。換言之，繼 2005 年調查「60 歲及以上」的人口高峰段之後，本次調查中「41-50 歲」再次出現高峰。隨着年長人口自然消亡，

在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程度持續改善的前提下，純粹的「果腹之需」和「傳統文化認知」顯然不能完全覆蓋其背後的食用動機。那麼，新的峰值是否意味着新的動機需求？「新的動機」又是如何產生的，是「內在驅動」還是「外在馴化」所致？目前，我們僅從「文化程度」與食用行為變化的對比分析中，以期獲取一些啟示和印證。

為此，我們專門抽取了「食用」轉變到「不食用」的 222 個樣本，着重分析「文化程度」的比較差異（食用行為變化人口百分比 / 總體人口百分比）（圖 5）。發現「文化程度」與此類食用行為變化的相對差異顯著：「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的轉變的相對比例更高，而「大專」、「大學本科及以上」恰恰更低，即更高文化程度的個體往往更不能實現轉變。換言之，公眾食用行為改善變化並非受教育文化程度所能決定的，或者是現有教育活動並不能帶給公眾良好食用行為的自覺提升。「文化程度」的高低究竟又意味着什麼？實際上，有關人類健康行為研究對此給予了一種可能的解釋。1977 年班杜拉（Bandura）提出人、行為與環境的交互決定論——認為行為主體自身具有主動學習和模仿他人的能力（Bandura, 1977）。人的行為既可以是一個具體的結果，也可以成為他們行為的環境。而人類健康行為更多是具有社會屬性的社會行為，體現於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與環境相適應的行為習得，如社會生活行為、社會角色行為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則是個人後天習得（學習能力因素）和外部社會環境。比較而言，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技術等主要影響行為者個體，且能決定個體學習能力和接受環境作用的程度，行為者對這些因素的控制能力也較大；而風俗習慣、社會經濟、法律制度等因素會在更大範圍內影響人群的行為，個體對這些因素的控制能力非常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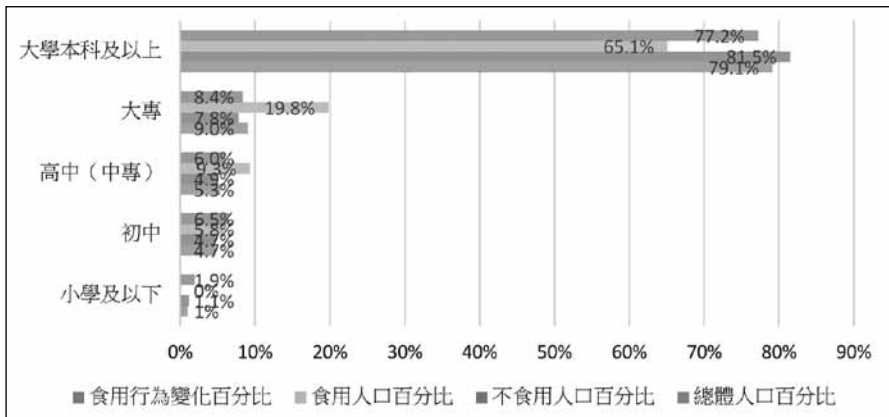


圖 5 文化程度佔比對比

基於此，假如一個人的文化程度至少能夠體現其個體的學習能力，比如說能更好的掌握科學文化知識，或者更強的社會學習能力。但若個體所擁有科學理性能力與社會環境作用存在張力，行為改善則更多取決於外部社會環境。概言之，公眾食用行為改變更多地是受到其自身社會活動或者環境的影響，可能遭遇個體內在價值訴求同外在社會規訓要求（如地位消費需求等）之間的緊張關係，構成了個體行為邏輯的「內外部衝突」，甚或出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背離的困惑體驗，促成「精緻利己主義」蔓延。正如韋伯所批判現代社會普遍存在「有利於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有損於價值理性」（哈貝馬斯，2004）。阿格尼絲·赫勒也針對現代性問題中的個體同其生存環境的衝突化解，提出可能路徑之一就是憑藉個體的文化創造過程為其自身的生存方式提供社會承認的辯護（阿格尼絲·赫勒，2005）。從這一點意義上來說，文化程度高低可能意味着個體適應生存而予以辯護能力的大小或實現個體「精緻利己」能力高低。除了需要反思教育活動自身之外，我們更希望看到禁食野生動物政策必須考慮到更為廣泛的社會性因素和外在制度環境改善。

六 討論與結語

食用野生動物作為人類社會變遷中長期既存的社會習慣現象，是一種極為複雜多元的社會實踐生成。其中既有歷史文化淵源的廣泛影響，又有現實法律政策的規制引導，既存公眾內在主觀、主觀能動與理性建構的可能，又存於外在社會成長環境的持續「濡化」，既需時代文明引領提升，更需個體道德自覺意識。正因如此，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也應該對此付諸努力，進一步深入持續開展相關的調查研究。本項調查研究正是秉持這種「求知」初心，試圖更為全面準確理解分析當前我國公眾食用野生動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以及「怎麼辦」的問題。

通過本文前期調查，當前公眾食用野生動物樣態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呈現持續下降態勢，並非普遍現象。特別是伴隨我國物質財富極大增長的同時，社會開放、包容和個體理性文明日益彰顯，純粹的物質「暴發戶」形象顯然難以覆蓋全面。同時，也取得了一些有關行為特徵的初步發現：「性別差異化」、「消費精英化」和行為養成的「內外衝突性」。「性別差異化」即相對女性而言「男人更愛吃」，而女性則更樂於接受良好食用行為轉變；「消費精英化」則更多基於職業分層所表現出來的食用野生動物行為特徵，作為一種現代消費活動，食用野生動物更多集中在精英階層；「內外衝突性」則主要體現在公眾良好食用行為養成與改善轉變可能存在「個體內外」的作用衝突，即個體內在因素與外部社會環境之間的張力。

當然，這些初步發現將為我們確立後續研究的重點議題及其方法改進提供有意義的積累和啟示：首先，對於精英階層究竟如何影響食用行為，有待進一步深入其中，需要開展更多深度訪談和類型化研究。畢竟「精英」是相對而言，也是多

樣的，比如在一定制度環境中部分商業精英也可能無意識地附庸「風雅」。第二，公眾食用野生動物行為動機及其變遷分析。「年齡」與公眾食用野生動物並非線性關係，而是呈現出繼 1999 年調查的「60 歲以上」高峰段之後，當前 41-50 歲年齡段食用行為呈現出第二次高峰段。其背後各具什麼食用動機？有無變化以及如何變遷等等，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我們將在前期調查基礎上，着重從社會變遷的視角深入透析公眾食用和不食用行為動機及其不同時段動機變遷機理。第三，公眾良好食用行為學習與改善轉變的影響因素及機理研究，特別是涉及到個體能動性與制度作用（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規制）的相互影響，以及制度建構的意義及其限度分析。初步發現「文化程度」反向影響食用行為改善，這無疑是吊詭的。顯然，有關「年齡」和「文化程度」的初步發現一方面迥異於既往研究結論，另一方面也為理解公眾食用行為改善學習的影響因素提供啟發，即兩者均屬於影響行為者的內在因素。前者偏重於從個體層面瞭解行為改善變化的意義，後者則有助於從總體層面理解行為改善學習的意義。而外部社會環境對於更大範圍內行為者的學習轉變具有更強改善意義。後期我們將就此開展持續調查和分析。此外，基於當前公眾的政策認知和認同狀況，試圖對於相關政策設計作一些策略性思考和建議。

當然，對於此類較為複雜的社會存在葆有多元、寬容、理性態度和立場，也是重塑良好社會習慣的應有之義。任何試圖建立良好習慣的過程必然充滿變數，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意味可以脫離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社會環境而被單獨建構出來。它往往需要牽涉到方方面面，而且持續很長時間，需把握關鍵契機，整合相關資源，持續推動相關工作。從政策建構層面而言，無論是「保護野生動物資源」抑或「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均需有效契合公眾行為特徵和真實需求，建立系統治理思維及

其制度轉換路徑。在具體策略上，需作出相應合理的分類安排，盡量減少規範和實體、實然和應然之間張力，並通過影響行為效用變化、策略選擇，持續塑造社會行為進而內化為社會習慣。而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每一位公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理應為構建良好治理生態和社會環境身體力行。

參考文獻

- 王明珂 (2006)：《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王賽時 (1998)：〈中國古代食用野禽的史實考察〉，載《中國烹飪研究》，總第 2 期，頁 31-37。
- 尤爾根·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著，曹衛東等譯 (2004)：《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西敏司 (Sidney W. Mintz) 著，王超等譯 (2018)：《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寧寧 (2009)：〈內地近 30% 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專家呼籲為反家暴立法〉，<http://npc.people.com.cn/n/2015/1014/c14576-27695659.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1 日。
- 余清楚 (2016)：〈人民日報評評王林現象：少數官員不信馬列信鬼神該猛醒〉，<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730/c40531-22373671.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11 月 2 日。
- 阿格尼絲·赫勒 (Heller Ágnes) 著，李瑞華等譯 (2005)：《現代性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 約翰·伊特韋爾 (John Eatwell) 著，陳岱孫等譯 (1996)：《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 (第 4 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時小琳 (2012)：〈食用型野生動物供需的影響因素分析〉，載《中國林業經濟》，總第 4 期，頁 6-9。
- 張文娟 (2020)：〈人類與野生動物，應該如何共存？〉，載《中國生態文明》，總第 1 期，頁 61-65。
- 陸學藝 (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 社，2002年。
- 曾建平（2020）：〈濫食「野味」的倫理審視〉，載《道德與文明》，總第03期，頁42-45。
- 楊猛（2006）：〈中國食用野生動物內幕調查〉，<http://tech.sina.com.cn/d/2006-04-29/1127923787.shtml>，瀏覽日期：2021年10月20日。
- 劉瑞瑩（2018）：〈更多中國人放棄肉食開始吃素〉，《環球日報》，北京：環球時報社，第5版。
- 陳嘉傑（2020）：〈新冠肺炎疫情視野下人類食用野生動物的道德反思〉，載《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總第3期，頁25-29。
- 龐仙（2020）：〈聚焦兩會：「九龍治水」治得好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900272748273254&wfi=spider&for=pc>，瀏覽日期：2021年10月29日。
- 騰訊網（2021）：〈徽州宴老闆娘終於認錯，告訴我們：德不配位時，再多的錢也是負擔〉，<https://new.qq.com/omn/20210713/20210713A0D1HZ00.html>，瀏覽日期：2021年10月20日。
- Adams, Carol J (2000),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 Blau, Peter M, &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andura, Albert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84, No. 2, pp. 191-215.
- Brown, Donald Edward (1991), *Human Universal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Chi, Yeong-Nain, & E, Jane Luzar (1997), "A Tobit Expenditure Analysis of Nonconsumptive Wildlife Recreation",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Study*, Vol. 10, No.4, pp.41-57.
- Frank, Robert Harris (2010), *Luxury Fever: Weighing the Cost of Exc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yakawa, Samuel Ichiye (1963), *Symbol, Status,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Kao, Grace Yia-Hei (2005), "Consistency in Ecofeminist Ethics: Con-Textual Moral Vegetarianism and Abor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Vol. 3, No.11, p11-21.